

文章太守欧阳修

李洪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文章太守欧阳修

李洪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章太守欧阳修 / 李洪连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43-4011-7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欧阳修 (1007 ~ 1072) — 文学研究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1673 号

文章太守欧阳修

李洪连 著

责任编辑 罗小红
特邀编辑 刘 玥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 品 尺 寸 165 mm × 23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011-7
定 价 38.5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期，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又是两宋文化发展尤为关键的阶段。之所以说其关键，是因为此时乃宋学基本方法与理论的形成期，具体表现在学风与文风的两大变革上。而这两大变革的引领风潮者，正是欧阳永叔。

北宋学风变革的分水岭在仁宗庆历时期。庆历新风的实质乃疑古惑经。晁公武说：“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敞（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郡斋读书志》卷四）王应麟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三）这种对汉唐之学的彻底摆落，其实质表明了宋学的基本成形。晁公武、王应麟等南宋学者注意到了在庆历学风新变中的代表人物刘敞及其《七经小传》，但这场学风变革的真正干将实乃刘敞的好友欧阳修。欧阳修用其《诗本义》拉开了宋代《诗》学革新运动的序幕。《诗传遗说》载：“（朱熹）因言欧阳《诗本义》而曰：‘礼义大本复明于世，固周、程之功，然近世诸儒亦为有助。旧来儒者谈经不越乎注疏而已，至孙明复、刘

原父及永叔，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盖是运数将开，此理复将明于世故耳。”朱熹把欧阳修《诗本义》之类经学新著的出现目为“运数将开，此理复将明于世”，足见朱熹对庆历《诗》学变革特别是欧阳修所起作用的高度赞扬。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诗本义》时也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之文，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此论无疑昭示了欧阳修其宋代学风变革第一人的重要地位。朱彝尊《经义考》亦云：“由汉以至本朝千余年间，号为通（《诗》）经者不过经述毛、郑，……惟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曾不轻议二家之短长，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诗人之意。其后王文公、苏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氏发之。”既云“开百世之惑”，则又将欧阳修对宋学发展的开创之功推崇备至。

欧阳修对宋代文风的革新作用丝毫不逊于其在学风上的表现。《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说：“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槟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皆响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正是因为欧阳修，方才使得“一时文章大变”。欧阳修文风变革的实质是续接西

汉文风。这是对流俗之文“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等病态现象的纠正。西汉乃经学极盛时代，西汉文章无不蕴涵强烈的经学色彩。这种文学经学化现象，有其简质、朴实的审美特征，对于矫正一味崇尚声律和华美辞藻的不良创作趋向有特殊意义。李清照《论词》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欧阳修的“往往不协音律”正是其文风变革思想的充分体现。其《六经简要说》认为“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而能否达意才是最重要的。其所以推崇西汉文风，那是因为“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兹所以为难”。欧阳修看重的是汉文的“质而不俚”，而时文缺少的正是这种特质，通篇充斥的不是风花雪月之辞，就是无病呻吟之事。矫正文学发展时弊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宗经，因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送王陶序》），而强化文学作品为时、为事、为君、为臣的社会内容，无疑正是欧阳修所处时代文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欧阳修评谢景山之妹谢希孟诗作时说：“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由古幽娴淑女之风。……昔卫庄姜、许穆夫人。录于仲尼而列之《国风》，今有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一为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复何为哉！复何为哉！”（《谢氏诗序》）欧阳修借品评同时代一女子诗歌，阐明了其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范型——言辞隐约深厚，内容温柔敦厚，准之风雅，取信后世。欧阳修不但如是说，而且在其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做的。

李洪连君所著《文章太守欧阳修》一书，从多视角探析了欧阳修及其著述。首先，该书论述了欧阳修所处社会时代的基本特点，对北宋的政治环境以及重用文臣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作者梳理了欧阳修生平经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欧阳修成长经历，为探讨欧阳修的学术与文学思想打下基础。最后，该书分别从文学、经学和史学等方面探析了欧阳修的学术与文学思想。就文学方面而言，该书紧扣古文运动思潮下的文学发展，通过具体分析欧阳修的散文与诗词作品，揭示欧阳修“文与道”之主张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的种种表现。这些分析是比较全面、深刻而细致的。就学术思想方面而言，该著以《诗本义》为中心，对欧阳修的经学思想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述。引述材料丰富，阐释比较系统，所形成的结论较令人信服，对进一步研究欧阳修学术思想有积极意义。该书对欧阳修史学思想分析也准确而深入，这些无疑均有助于欧阳修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欧阳修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李洪连的新著《文章太守欧阳修》无疑是对这个庞大课题所作的一种积极有益探索。虽不能说所取得的成绩巨大，但至少可以说明“有宋一代，我国学术史上文学史上一大转变之期也，而执其枢纽者，实为欧阳修”（詹道湘《欧阳修文学及其文学批评》）。

是为序。

二零一五年五月谭德兴于花溪

目 录

第一章 欧阳修所处时代的特点	001
第一节 宋朝的内外之患	002
第二节 重用文臣	006
第二章 欧阳修生平经历	008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欧阳修	008
第二节 入仕时期的欧阳修	011
第三章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020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背景	020
第二节 文与道的主张	022
第四章 欧阳修的散文	027
第一节 欧阳修的论辩文	028
第二节 欧阳修的记叙文	053
第三节 欧阳修的抒情文	057
第四节 欧阳修的碑志文	062
第五章 欧阳修的诗词	066
第一节 欧阳修的诗歌	066

第二节 欧阳修的词	082
第六章 欧阳修的经学	091
第一节 欧阳修的经学主张	091
第二节 宋前《诗》学研究	093
第三节 《诗本义》的理论	104
第四节 《诗本义》批毛郑之说	111
第五节 《诗本义》的解《诗》方法	116
第六节 《诗本义》的缺失之处和影响	135
第七章 欧阳修的史学	144
第一节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144
第二节 欧阳修的史学著作	149
主要参考书目	153

第一章

欧阳修所处时代的特点

欧阳修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作为政治家的他在北宋政坛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作为文学家的他“文备众体”、著作丰富，做出了巨大的文学贡献。他对经典古籍《周易》《诗》《春秋》《周礼》都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另还著《六一诗话》，从这点来看，欧阳修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作为史学家，他主持撰写了《新五代史》，修撰《新唐书》。他的《集古录》是金石学开创性的著作。

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欧阳修所处时代正值北宋由盛转衰时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

一方面，国内官吏人数众多、官僚队伍庞大，官府职能机构行政效率低、互相推诿，老百姓生活困难；另一方面，辽和西夏始终骚扰威胁边疆。在此情况之下，范仲淹等人于庆历三年（1043）提出整顿吏治的

新政主张，具体为重命令、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精贡举、修武备、择官长、厚农桑、覃恩信。作为谏官的欧阳修也积极上疏言事，直陈时弊，主张改革。宋仁宗同意并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开始施行新政。由于新政的许多主张损害了贵族官僚阶层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百般阻挠，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也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庆历新政的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失败，朝廷内部矛盾和国家的内忧外患问题仍旧突出，并且益严重。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改革主张，开始了从熙宁二年（1069）起至元丰八年（1085）结束的熙宁变法。该变法主张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熙宁变法因损害了百姓和大地主的利益而遭到各方面强烈反对，最终在元丰八年（1085）告终。

两次变法表明宋朝在政治上实行了开明和宽容的政策，文人志士们纷纷畅所欲言、直陈时政、解放思想、呼吁改革。政治上开明宽松的环境也给文化带来了全面繁荣。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的欧阳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之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文学才能，为我国古代文学、经学、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宋朝的内外之患

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王朝。祥兴二年（1279），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殉国，宋朝彻底灭亡。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又分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阶段，总共经历了

近 320 年的时间。

中唐以来，君弱臣强，诸侯叛命，兵祸连连，民不聊生。为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宋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接受赵普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藩镇势力，将军权、政权、财权紧握，加强中央集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载：

一日，（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赵普认为，导致中唐以来帝王易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的原因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是加强中央集权，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接着，赵普建议应从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方面削弱藩镇势力，将军权、政权、财权集中在中央。

第一，集中军权。首先，收回兵权。建隆二年，即公元 961 年，宋太祖为防范将帅利用军权威胁中央，造成军事政变，以“杯酒释兵权”轻松地将石守信等将领的兵权收回，解除了他们的军职。其次，改组兵制。将全国的军队设为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类。对禁军进行改组。设殿前司和侍卫司，将殿前司设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以“三帅”分别管理禁军，并互不牵连，互不统属，各自听命于皇帝。即使执掌军政的枢密使，也不能指挥禁军，造成枢密使与“三帅”将领互相牵制的局面，使军权和军队分离，避免拥兵自重。同时，以“更戍法”管理禁军，屯驻地点常常更换，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防止将领拥兵自重。这样一来，兵权和精兵都掌握在皇帝手中，有效地防范了军事政变的发生。

第二，集中政权。在政权方面，为分解各级官吏的权力，宋太祖调整

改革官僚机构体制，设立“二府”和“三司”机构，将之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权分割，让枢密使和宰相“对掌大政”。枢密院掌管军政，直接听命于皇帝，宰相不得干预。枢密使只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实。将调兵之权与领兵之权分离，使枢密使与将领互相牵制。为了削减宰相的权力，除了设枢密使执掌军事外，还设三司使管理财务，宰相只主持行政。削弱武将任职的范围，实行文官统治。在中央和地方都施行一些缩小官吏职能范围的措施，且县级以上的官员都由中央委派，三年一换。朝廷紧握政权，起到防范官吏权力膨胀的作用。

第三，集中财权。宋太祖为避免重蹈覆辙，防范藩镇割据、地方与中央抗衡的情况发生，将财权集中于朝廷。规定国家的财政收入由各路转运使主管，并分派“监当使臣”监收各地，不许地方官吏涉入。各地财政收入，除少量的地方费用外，其余全部送缴朝廷。这样，财权集中于朝廷，有效地杜绝了地方同中央抗衡的情况出现。

朝廷集中军权、政权、财权，起到了稳定政局、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树立了君威和国威，也有效地防范了地方藩镇割据、地方抗衡中央、官吏权势膨胀情况的发生。加强中央集权后，社会相对稳定统一，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都有较大发展和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正是北宋王朝的鼎盛时期。

但是，在经历一段时间过后，中央集权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了出来。宋太祖之后的君王因循守旧，没能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墨守成规，集权的消极因素膨胀，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三冗”“两积”局面，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

“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冗，即多。冗官指官吏冗多。宋初，朝廷实行“恩荫制”和“特恩制”，即官吏子孙亲族俱可得官。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兵权的都是文职人员，朝廷通过科举考

试大量招纳文士参政。另外，为让官吏之间互相牵制，朝廷又新设立许多职位，机构重叠，致使官吏数量激增，机构人员数量庞大。官吏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转，相反，行政效率极低。机构重叠，工作职责不明确。官吏们遇事推诿，无所事事。朝廷监察不力，缺乏统筹管理，吏治腐败。

宋朝兵员冗滥。宋太祖为防止百姓犯上作乱，大量招募灾民入伍。军队士兵数量的激增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军队没有因士兵众多而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军队纪律松弛，士兵骄纵懒惰，致使仁宗用兵之时，连连败北。

冗费指朝廷财政困乏。宋朝兵饷和官俸负担沉重，军队士兵数量庞大，军费开支惊人。官吏数量的庞大也致使官俸支出浩大。此外，皇帝的“恩赏”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国家冗费，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也给宋朝社会带来严重危机。

虽然如此，宋王朝仍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在宋初之时，为稳定百姓，巩固统治，朝廷制定奖励垦荒的轻徭薄赋政策。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得商品经济活跃起来。但是这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官户享受特殊的免税和免役权利，他们依仗权势采取各种方式巧取豪夺，疯狂地兼并土地。大部分赋税转移到了贫困的劳动者身上，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使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日益扩大化，以至于发生了后来的农民武装起义运动。淳化四年（993）王小波等人发动农民起义运动，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提出“平均主义”的口号。咸丰三年（1000）又发生四川王均领导的士兵暴动。影响比较大的则是庆历三年（1043）沂州士兵起义，就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几场起义更是风起云涌，有席卷天下之势。此时的宋朝似空中危楼摇摇欲坠，国家亟待输入新鲜的血液，改革弊政。

第二节 重用文臣

宋初，为与民休息，巩固中央政权，朝廷制定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政策。同时，创造了比较开明、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宋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宋代的科举考试是官僚进用的主要途径，给文人提供了进阶上层的机会。同时，宋代科举取士制度严密，考试纪律严明，实行“糊名”“誊录”等方法，杜绝营私舞弊。不问门第身份，唯才是举。只要进士及第，一般都直接授官，打破了豪门贵族对仕途的垄断。宋代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都选用文人任职，如果科举考试高中状元，皇帝临轩放榜，荣耀异常，而且升迁迅速，不及十年，即可授以大权。宋代还在经济上提高文人的地位，即实施优厚的官禄。宋代官吏俸禄名目繁多，病卒后有赐银，官户享有免税役等特权，甚至官吏家属子女也享有种种优待。宋代还制定不滥杀文人士大夫制度。

在这样开明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下，宋代文人思想活跃，开拓创新，有较充分的言论和创作自由。民间私人书院也蓬勃兴起，自由讲学风气盛行，为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提供了条件，成就了一些寒士，如杜衍、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栋梁之才和文学巨匠。朝廷不仅积极录用有识之士，还鼓励文人上书言事。朝廷对文人的重用也激发了文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曾积极地上疏议政，很多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同和实施。欧阳修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提出改革主张，如《原弊》《准诏言事上书》等都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有深刻理性的认识和评价，以积极饱满

的热情指斥时弊，参与时政，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希望改革国家制度中不合理的一面。

基于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朝廷需要缓解社会矛盾、化解阶级危机的新政策。靠武力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唯有从政策上改革时弊才能缓解矛盾，保全自身，稳固统治。夏传才先生在这一点上早已说得透彻：“宋代已进入后期封建社会，有三大社会矛盾：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农民武装起义的烽火燃烧不熄。封建统治者在进行暴力镇压的同时，也需要利用儒学给人民带上精神枷锁。二、民族矛盾尖锐，宋代封建统治者需要利用儒学的‘尊王攘夷’这面旗帜来动员力量保卫其生存和统治。三、经过唐末和封建社会伦常纲纪被破坏无遗，封建统治者需要通过儒学来重整伦常，以维持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儒学已经僵化的汉学体系，不适应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造。宋统治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提倡尊孔读经，以经义论策重用文臣。这也就意味着要求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突破旧的经书义疏，发挥合乎实际的创见。”^①在政治允许的大前提下，宋朝文人思变之风兴起，如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

欧阳修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忧外患、朝廷经义论策重用文臣的环境中。在此背景下，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史、经学方面成就卓著。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思想合二为一，体现文学与政治、经学与政治、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如《诗本义》就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经学研究著作，体现《诗》学研究的政治化，开宋朝思变之风的先例，在欧阳修之后，苏辙、朱熹等人的疑古思潮涌起，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① 夏传才. 诗经研究史概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6): 106.

第二章

欧阳修生平经历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县（今江西）人，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不仅兼长各体文学，对经、史都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成就卓越。他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葬于河南新郑，其间在随州（今属湖北）度过了少年时代，晚年时定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欧阳修

一、入仕之前

欧阳修少时生活贫苦，但受到母亲和叔父的启蒙，加上他本人的刻苦